

敦煌曲子詞研究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

朱鳳玉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敦煌文獻的發現，就中國文學的立場來看，其最重要的當是變文、曲子詞、唐人詩歌等文學作品。另一方面，由於文學相對於其他學科而言，它和民族的心理健康關係最為密切，中國學者在這一方面有一種天然的優勢，最能夠理解中華民族的心理，因此在探研敦煌文學方面，較其他國家的學者，自有一種獨特的條件。敦煌學的文學研究是較早開始的，相較於其他國家或其他敦煌學的領域而言，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最為突出，成果也最為豐碩。其中，除了變文外，最受矚目的當屬曲子詞。

敦煌曲子詞的發現，既豐富了唐五代的詞作；又提供了早期各式詞體，使得詞的起源問題必須重新檢討，中國詞史更不得不改寫。因此自發現以來，學者多所研究，不但陸續有整理校錄的文本出版，同時也有不少頗具系統而深入的研究論著產生，不禁令人懷疑，敦煌文學研究的未來，是否還有發展的門路與空間？

因此本文擬考察 1920 年到 2000 年這 80 年來有關敦煌曲子詞的論著，以文獻目錄學為基礎，依歷史與分類專題總帳式進行，並以宏觀的學術史角度來考察，以微觀析論、歸納前賢的研究方法，並比較其優劣，尋求理想的研究方法，以提供往後敦煌曲子詞研究發展之參考。

關鍵詞：敦煌 曲子詞 敦煌曲 雲謠集 唐五代

一、前言

自 1900 年敦煌藏經洞發現以來，已經歷了一百年的歷程。就中國敦煌學研究發展而言，敦煌文學研究是較早開始，且成就最為突出，成果也最為豐碩。不論是文人的雅文學、或民間流傳的俗文學，在研究的質與量都有極為卓越的成果。根據《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漢學研究中心，2000.04）的著錄，其收入有關中、日文敦煌文學研究論著便有 1829 篇之多。尤其許多重要的門類，如敦煌變文、敦煌曲子詞、王梵志詩、敦煌的詩歌，不但陸續有整理校錄的文本出版，同時也有不少頗具系統而深入的研究論著產生。不禁令人懷疑，敦煌文學研究的未來，是否還有發展的門路與空間？

余曾再三思索，以為：學術研究發展的生命力在於新材料、新方法、與新觀點。因此，只要我們能持續的發掘新材料，或系統地吸取研究成果、利用妥適的新研究方法來探討新的問題，或對舊問題展開新的詮釋。如此一來，敦煌文學研究仍然可以煥發出新的活力，開拓出學術的新天地。有鑑於此，本人特擬定「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計畫，承國科會之獎勵，正進入執行第二年¹。因此對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展開考察，對敦煌文獻中的文學材料進行系統發掘；對研究論著進行總帳的論述並客觀的評賞；同時對敦煌文學的研究方法進行考察研究，希望能為敦煌文學研究的持續發展提供寶貴的參考²。

敦煌文獻的發現，就中國文學的立場來看，其最重要的當是變文、曲子詞、唐人詩歌等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又由於文學相對於其他學科而言，它和民族的心理關係最為密切，中國學者在這一方面有一種天然的優勢，最能夠理解中華民族的心理，因此在探研敦煌文學方面，較其他國家的學者，自有一種獨特的條件。敦煌學的文學研究是較早開始的，相較於其他國家或其他敦煌學的領域而言，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最為突出，成果也最為豐碩。其中，除了變文外，最受矚目的當屬曲子詞。敦煌曲子詞的發現，既豐富了唐五代的詞作；又提供了早期各式詞體，使得詞的起源問題必須重新檢討，中國詞史更不得不改寫。因此本文擬以《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所著錄有關敦煌曲子詞的篇章為基礎，並參考鄭阿財、蔡忠霖編《敦煌學論著目錄·續》（1997-2000）等相關資料³，進行敦煌曲子詞研究之述評工作，並考察前賢敦煌曲子研究方法之特點，希冀從前賢研究成果中吸取經驗，以為未來敦煌曲子詞研究發展之參考與借鑒。

¹本計畫獲國科會獎勵補助三年，計畫編號：NSC 91-2411-H-415-001，執行期間：

2002.08.01-2005.07.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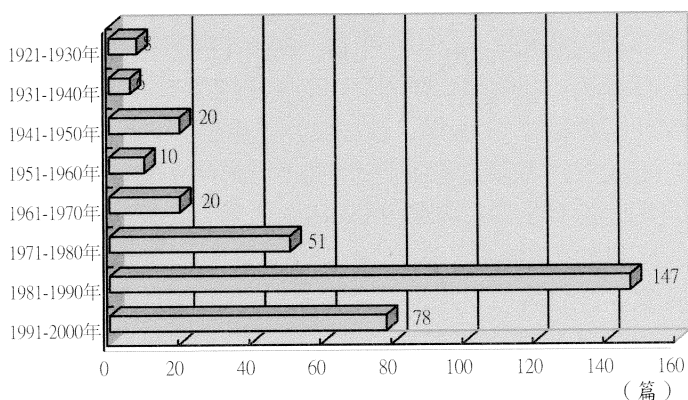
²先後撰寫有關的論文有：〈臺灣地區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與展望〉（『國際敦煌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理工大學，2002.8.25-28。）；〈俄藏敦煌文獻 11-17 冊中之文學文獻敘錄〉。（《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法光出版社，2003.07。）頁 57-116；〈王重民先生與敦煌文學研究〉（《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1-13。

³載《敦煌學》24 輯，2003 年 6 月，頁 227-292。

二、 敦煌曲子詞研究成果計量分析

敦煌藏經洞雖然發現在 1900 年，從 1920 年王國維〈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⁴一文中首次公佈了〈望江南〉及〈菩薩蠻〉等三首敦煌曲子詞以來，直到 2000 年的 80 年間，敦煌學、詞學及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對敦煌曲子詞研究已發表的篇章，初步統計，總計有 340 篇。以下謹以十年為一階段，計分為八個時期，將研究成果計量統計表列如下，並嘗試進行考察與詮釋如下：

敦煌曲子詞論著分期量化表



第一期，從 1921 年到 1930 年，計有王國維、朱孝臧及羅振玉等人的 8 篇短文，主要是有關《雲謠集雜曲子》的跋與輯校。第二期，1931 年到 1940 年，計有龍沐勛、鄭振鐸等人的 6 篇，主要也是有關《雲謠集雜曲子》的跋及錄文。第一二期的研究篇章最少，且多為跋文、錄文或簡短介紹，且主要內容蓋為《雲謠集雜曲子》。主要因曲子詞資料，大多為斯坦因、伯希和所掠取，分別度藏於英、法等國，當時國人不易獲睹。其中《雲謠集》，是最早為國人所知悉，且為現存最早之詞集，其成編遠在五代趙崇祚《花間集》之前，自然深受國內敦煌學及詞學研究者所矚目。而敦煌《雲謠集》寫本自從被斯坦因、伯希和取走後，直到 1912 年，才由日本的狩野直喜錄得英藏的《雲謠集》部分錄文，而最早見到狩野錄文的，是羅振玉和王國維，因此也才有跋文的撰寫。1922 年，國內出現第一個《雲謠集》刻本，也是國內第一部敦煌曲子詞刻本。先是董康旅歐時，在倫敦錄下了 S.1441 的《雲謠集雜曲子》18 首，其後彊村老人朱祖謀據以刻入《彊村叢書》卷首。後羅振玉得伯希和寄來 S.1441 號《雲謠集》照片，乃於 1924 年據以刻入《敦煌零拾》。1925 年，劉復將他在巴黎披閱敦煌寫卷輯錄的資料，彙印成

⁴ 載《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8 號，1920 年。

《敦煌掇瑣》出版。其中便有 P.2838 號《雲謠集》14 首。1932 年，龍沐勛承其師朱古微遺志，將 30 首輯入《彊村叢書》，為第一個《雲謠集》全本的傳世。

第三期從 1941 年到 1950 年，計有冒廣生、張爾田、趙尊嶽、唐圭璋、王重民等人的 20 篇論著。此期的特點是作者大半為詞學研究者，而研究的內容雖然仍然延續前二期，主要是有關《雲謠集雜曲子》的跋及校釋。但在研究主題上已漸有拓展，如傅芸子、王重民等對《五更轉》、《十二時》等俗曲開始展開收輯與論述。特具研究意義的是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一書的出版。此書成書於 1940 年，1950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計收錄曲子詞 162 首。全集三卷：上卷長短句，收 107 首；中卷為《雲謠集雜曲子》，收 30 首；下卷為詞，收 24 首。王重民先生在諸家校集的基礎上，並根據法國巴黎所藏伯希和所獲敦煌曲子詞寫卷十七件，英國倫敦藏斯坦因所獲敦煌曲子詞寫卷十一件，羅振玉藏三件，日人橋川時雄藏影片一件，總計三十二件，共錄得曲子詞二百十三首，進行校補，除去複重五十一首，定著為一百六十二首。其中《雲謠集雜曲子》是最受詞學研究者矚目的一部異書。在敦煌文獻未發現前，五代趙崇祚編的《花間集》，是現存最早的一部「詞的總集」。敦煌《雲謠集》的重現，使得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詞的總集」應改寫為《雲謠集》了。因此，自來諸家校訂、研究不斷，幾乎中國的詞人學者對它都發生過或多或少的關係。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輯錄的出版，提供豐富寶貴的敦煌曲詞文本，其後中國文學史之撰，或唐宋詞學之研究者，大抵援引其中文本以立說，或據選注賞析。

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除了提供了難得的文本外，此書的敘錄中，論述曲子詞的內容特色；也對曲子詞的概念、起源，提出頗具參考價值的見解與看法。以為：雲謠集稱所選為『雜曲子』，而其他敦煌曲子詞寫卷，也多稱所選為曲子，是今所謂『詞』，古稱『曲子』。曲子所由脫變之樂府為『雜曲歌辭』，或『近代曲辭』。五七言樂府原稱詞（即辭字），或稱曲，而長短句則稱曲子也。特別是曲子既成為文士摘藻之一體，久而久之，遂稱自所造作為「詞」，而將俗製視為「曲子」，於是詞高而曲子卑矣。遂又統稱古曲子為詞。其次，詞之起源，由五七言變為長短句，蓋源於「泛聲」。今得敦煌曲子詞，其中字句較舊有者參差為尤甚，可為泛聲之故。又以為：詞由五七言變為長短句，蓋源於「泛聲」，而與歌舞關係尤有密切。特別敦煌寫卷 P.3808，有工尺譜一卷，載〈傾盃樂〉、〈西江月〉、〈伊州〉、〈水鼓子〉…等八譜；P.3501、S.5643 兩卷為舞譜，載〈遐方遠〉、〈南歌子〉、〈浣溪沙〉、〈鳳歸雲〉等六譜。若能將此三譜，被諸管弦，施於步伐，則不但古樂大明，倚聲之事，亦可迎刃而解。

第四期，1951 年到 1960 年，河山動亂始定，百廢待興，因此論著量少，計有任二北、王重民、俞平伯、關德棟、蔣禮鴻等人的論著 10 篇而已。雖然量少，但作者多為敦煌學及詞學名家，且多專著。其研究成果，對往後敦煌曲子詞的研究實具有深遠的影響，其中除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係前期著作的修訂再版外，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及《敦煌曲初探》姊妹篇之出版，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發展的關鍵期。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是 1955 年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

任氏在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的基礎上，又增錄了包含敦煌曲子詞、民間歌詞和大曲等在內的歌詞五百四十五首。在校錄的基礎上，任氏更出版《敦煌曲初探》，此書對敦煌所出唐、五代樂曲材料進行全面系統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首先對《敦煌曲校錄》所收五百四十五首敦煌曲分別調名、曲辭及內容做出統計，重點放在第二章「曲調考證」方面，對敦煌曲與《教坊記》之關係、對於大曲之貢獻、聯章四調、佛曲四調等都有考證與解說；「雜考與臆說」一章涉及有關敦煌曲起源、名稱、時代、內容、作者、體裁、修辭諸方面的考證。

此外，蔣禮鴻〈敦煌詞校議〉著重在敦煌曲詞的詞彙考釋，則是諸多研究中獨樹一幟的篇章。

第五期，從1961年到1970年，計有20篇。由於台灣地區播遷初定，研究人才尚待培育；而大陸1965以後又值文革，因此研究者主要為日本學者，如入矢義高、岡村繁、鈴木哲雄等，在論題方面特別關注禪宗的佛曲歌辭。

第六期，從1971年到1980年，共有51篇。此一期間的論著，主要幾乎全出自臺灣地區及海外學者之作，蓋以大陸文革浩劫，人心惶惶，學術一片空白。臺灣地區潘重規先生有16篇，主要以曲子詞的校訂為主，最具成果。另外林玫儀3篇，邱燮友2篇。而林玫儀《敦煌曲研究》則是研究敦煌曲子詞的第一本碩士論文。就論著課題而論，有關曲子詞校異訂補的有4篇；對個別曲詞進行研究的有9篇；有關定格聯章的有5篇；論述佛曲的有3篇；針對《雲謠集》校訂研究的有6篇；談論詞的起源有3篇；其他20多篇則為曲子詞通論。

此一階段，敦煌曲子詞整理研究的代表者主要有二：一是饒宗頤與法國戴密微合著的《敦煌曲》，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於巴黎出版。全書分《引論：敦煌曲與詞之起源》與《本編》兩部分。《引論》為理論探討，《本編》為寫卷校錄。共校錄敦煌曲辭318首。這是20世紀敦煌曲(含曲子詞)整理研究史上一個國際合作的創舉，頗具影響。

一是潘重規師的《雲謠集新書》及《敦煌詞話》。1976年8月，潘先生赴巴黎參加漢學會議，並進行研究工作，卻因航空公司遺失行李之因緣，轉而對敦煌《雲謠集》此一中國最早詞集進行研究。在與原卷細校之後，發現長久以來之諸多問題，並加以解決。如〈鳳歸雲〉二首題為「閨怨」，所以分寫在二首詞下，羅振玉將「閨」誤作「偏」字，乃誤「鳳歸雲偏」為詞牌名；王重民則以為「怨」字係正文，而誤將第一句作「怨綠窗獨坐」。先生遂將原卷的全部照片加以影印，附上摹本，並參校各家，作成定本，撰成《敦煌雲謠集新書》，此一完美的整理方式，遂成董理敦煌文獻之法式。

繼《敦煌雲謠集新書》完成之後，潘先生又將披閱英法藏卷的獨到見解，陸續撰文發表於報章雜誌，總計有12篇之多，以其豐富之學養及對敦煌寫卷文字獨到之詁定功夫，訂正了大家對於敦煌曲子詞的許多誤認、誤校與誤改，提供敦煌曲子詞研究者正確之文本憑藉。

第七期，從1981年到1990年，計有147篇，是各期中論著數量最多，而論題多元，作者遽增，尤為此期的特色。其中臺灣地區有26篇；大陸地區也因1976

年文革結束，敦煌學研究逐漸恢復，特別是 80 年代以來，在日本等國敦煌學研究風潮的刺激下，敦煌學被列為中國國家學術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因此研究成果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任二北的持續整理研究，孫其芳、高國藩、柴劍虹、顏廷亮、項楚等的繼承與開創，大有老幹新枝，枝葉扶疏之架勢。就論題而論，進行校補勘誤的有 15 篇；對個別曲詞進研究的 30 篇；論述定格聯章的 10 篇；論述佛曲的 3 篇；研究雲謠集的 18 篇；研究曲調用韻的 8 篇；探討詞的源流 5 篇；論述《敦煌歌辭總編》的 5 篇；論述《敦煌曲子詞欣賞》的 4 篇，其餘 45 篇為通論。

此一階段中，臺灣主要代表作林玫儀的《敦煌曲子詞輯證初編》，全書凡十餘萬言，除前言及附錄外，計分上中下三編。上編「云謠集雜曲子」，計收錄〈鳳歸雲〉、〈天仙子〉、〈竹枝子〉…十三調，凡三十首。蓋以傳世詞集向以五代趙崇祚《花間集》為最早，敦煌《云謠集》的出現一改過去的成說，使得中國文學史、中國詞史有重新改寫之必要。不但如此，集中收錄的三十首雜曲子，風格較其他同出曲詞尤為典雅，彌足珍貴，且又自成單位，故作者將之列為上編；中編「普通雜曲子」，計收入〈贊普子〉、〈西江月〉、〈菩薩蠻〉……等及失調名之曲子詞凡一百二十首；下編「新增及殘曲子」，計收錄〈浣溪沙〉、〈酒泉子〉、〈生查子〉……及失調名等二十六首。作者於前輩研究之基礎，展開校錄，全書以求真為主，故凡原卷可通者，悉從原卷，諸家校釋雖或詞義較勝而顯非其真者，一概不取；原卷難通，無法校訂者，則存其舊以俟通博。全書以狹義的「曲子詞」觀點，即合乎傳統所謂「詞」的性質者，則加以採錄，總計收錄的敦煌曲子詞凡一百七十六首。書後附「諸本輯校曲子詞對照表」、「詞牌及原卷號碼對照表」、「斯卷伯卷所錄曲子詞表」等三附錄，頗便於參考。

而大陸最主要是任二北的《敦煌歌辭總編》的出版。任二北自 1972 年起，便在 50 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持續進行《敦煌歌辭總編》的編輯，1987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資料搜羅最宏富，大有集大成之意圖與氣派。全書凡分七卷，總計收錄作品 1221 首。其書名為「歌辭總編」，則輯錄不限於「曲子詞」甚明。因此範疇雖有爭議，然其收錄之廣，數量之大，所網羅屬於「曲子詞」作品與相關文獻材料之豐富可說前所未有。其文獻價值與貢獻實不容忽視。不過因任氏未能目睹原卷，且往往將原文並不存在，而是由自己主觀的設想，強加給原文，任臆改竄原文，也造成相當的爭議。因此針對《敦煌歌辭總編》進行論述校補的卻也成為論著的主要議題。

第八期，從 1991 年到 2000 年，共有 78 篇。論著篇章就數量而言，僅次於第七期。其中對個別曲詞進研究的有 10 篇；論述定格聯章的有 6 篇；論述佛曲的有 6 篇；研究雲謠集的有 6 篇；論述《敦煌歌辭總編》的有 5 篇；研究曲譜調式的有 7 篇；談論詞的起源有 1 篇；其餘 32 篇為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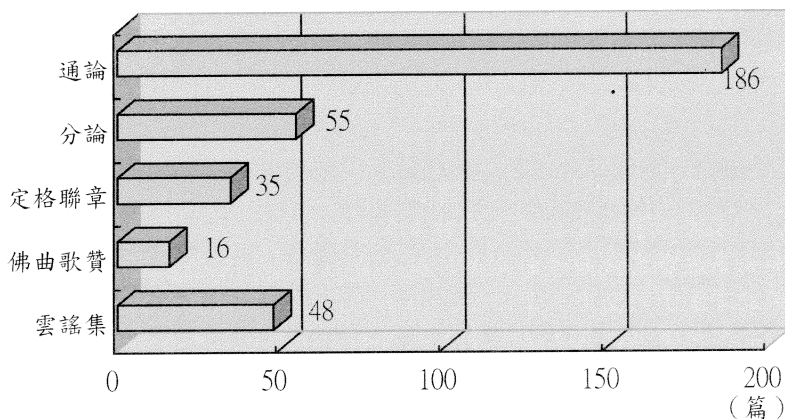
此期作者與論題不再集中，實為其特點之一。作者不集中，反映研究人口的增加；而論題的分散，則反映論題趨於多元化。蓋原典的整理已具，有可供研讀的文本以資研究，因此文本所蘊含的各種論題也就紛紛呈現。

綜合以上八十年的研究發展，似可分為三大階段：1920 年到 1940 年的第一兩個十年為第一階段，主要為敦煌曲子詞個別寫本的序跋及介紹，可說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萌芽期；1940 年到 1970 年的三十年為第二階段，這段期間，雖以海外的研究較具發展，然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及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與《敦煌曲初探》，此階段可說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成長期；1971 年到 2000 年這三十年為第三階段。在成長期的文獻整理基礎上，展開相關研究，其中研究隊伍的壯大，論著篇章的遽增與論題趨於多元，為其特點，可說是敦煌曲子詞研究開花結果的全盛期。

三、 敦煌曲子詞研究分類計量分析

敦煌曲子詞的整理與研究從 1920 年到 2000 年的 80 年間，初步統計，總述有 340 篇。茲據其分類計量表列如下：

曲子詞研究分類量化表



由上表可見，篇數最多的是通論，共有 186 篇之多，超過總述的一半。這說明敦煌曲子詞的發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事，因此論述敦煌曲子詞的發現、價值等相關問題，也就成為學界最關心的論題。特別是在詞學上的意義，因此有關詞的起源與發展等問題，不但是敦煌學者所急於探討的課題，詞學研究者或中國文學史研究者，均紛紛加入討論。所以此類通論性質的論題順理成章的成為敦煌曲子詞發現以來的熱門話題，篇章數量自然稱最。

篇章數量居次的是分論，計有 55 篇。蓋以敦煌藏經洞發現以後，大量寫卷文書旋即紛紛為英、法、俄、日所劫取，乃至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藝術

館、圖書館，甚至個人私藏多有收藏，國人獲睹不易。加以曲子詞抄本多為小測或夾雜抄寫於其他文書之行間、卷背，或卷末，單曲散片，頗不集中。能如《雲謠集》寫卷者少之又少。早期各國秘而不宣，或擁寶自重，不肯輕易示人；加以國家多難，長期動亂，以致國人研究多隨資料公布而呈現「尋寶式」或「抓吃式」，以單卷獨曲之序跋或校錄為多。其後雖有可資研究之文本，然曲調詞體之考辨，必然以各論為主，全面進行曠日廢時，也是條件所不許。因此多數為單一寫卷或某一「詞牌」、某一調式之研究為多。

至於《雲謠集曲子詞》之研究篇章雖居第三，計有 48 篇，然就敦煌寫卷而言，其數量可謂至多，且多專書。蓋以《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乃現存中國最早詞集，因此自發現以來便成為學界的焦點。各知名的詞學大家朱孝臧、龍沐勛、唐圭璋；國學大師羅振玉、王國維；文獻學家王重民等…，均紛紛加入此部詞集整理與研究的行列。也為近代詞學研究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增添了許多嶄新的材料。敦煌本《雲謠集》的校錄與敦煌曲子詞的彙集整理是近百年來唐五代文學研究的重大收穫。據此所延伸的詞學理論相關研究，更刺激而活絡了中國文學史與詞學的研究。《雲謠集》中的曲調詞牌及寫本的時代，不但提供了詞的起源再思考再反省的刺激，也提供詞的發展初期作品的實際佐證。

此外敦煌曲子詞作品的內容廣泛，舉凡兒女之情懷、閨婦之怨思、邊民之心聲、遊子之悲吟、伎女之感慨，包羅萬有，不一而足，洵為當時社會生活的實錄。且其文辭質樸，情意真率，深富民間文學清新動人之氣息，就文學價值言，尤為難得之瑰寶。因此除了校證文本，分別考辨詞調外，賞析詞文也是文學研究的一大工作。

定格聯章，是任二北《敦煌曲校錄》、《敦煌曲初探》、《敦煌詩歌總編》所擬定的一種稱名，指的是曲調一致，內容貫串，句式、段數都有固定格式的配樂組合。自南朝到唐五代，十分流行。因其數首聯章，各首體式固定，且多以數目為題，如〈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等，內容則是縉流世俗均見，而以釋門唱道、悟道之歌詠為多，極具佛教文學之特色，是晚進學者所關心之研究課題，為敦煌曲子詞開展原地，因此篇章數量亦頗有可觀。

四、敦煌曲子詞研究方法的考察

敦煌文學研究法相較於其他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探討是較為薄弱的一環。一般以文字校訂、內容考證為主。事實上，文體學、語言學、主題學、文化學等，乃至比較文學所使用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與主題學研究……等等，均常被前輩學者所運用，只是少有討論而已。敦煌曲子詞的研究方法也是一樣。

就學術研究而言，材料會影響方法的使用，方法也有助於研究成果的呈現。敦煌曲子詞研究是否有較為妥當適切的研究方法，似乎可從前賢研究中加以考察與提煉。茲謹就 80 年來有關敦煌曲子詞研究的成果，析論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概要論述如下：

(一) 文獻研究法

敦煌學的研究對象是莫高窟藏經洞所發現的五、六萬卷北宋以前的寫卷爲主。其中大多爲後世所不傳，而僅見於敦煌本的。因此所有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均建立在輯錄校勘的基礎上，這也是敦煌學的基本特色。

敦煌曲子詞的發現，書寫形式全爲寫本，或作卷子本，或爲小冊子本，或是縫饋裝，甚至是殘葉片段；至於書寫字體更因曲詞抄寫者的文化水平有限，既是隨意抄寫，字體俗訛通假，觸目可見。因此較之其他研究，更迫切需要校理出可供閱讀與研究之整理本。

初期學者對於敦煌曲子詞的整理輯錄，主要從文獻保存出發，著重在原卷面目的保存，其基本態度乃在於「存真」。因此，在輯錄的過程中，對於寫卷的文字不輕易加以增刪改易。如王國維、羅振玉、劉半農、王重民……等，基本都是如此，這可說是文獻學家的基本治學態度的具體呈現。而敦煌文獻的發現，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四大發現之一，本來就屬於文獻學的範疇。敦煌曲子詞的整理輯錄自然是文獻學的重要工作。因此，敦煌曲子詞的校輯工作此一體現也就更爲深刻。

但是這種求真的精神，展現在敦煌曲子詞的整理工作，並非只是求取寫卷的原貌而已。否則只要據原卷照相也就可以了。事實上不然，我們所要的除了寫卷的原貌外，更需要寫卷所根據抄寫的原本的真實情況。潘重規先生《敦煌雲謠集新書》，可說是最爲理想的的整理方式。過去研究《雲謠集》者，因未見原卷，以致產生很大誤會。如校錄敦煌曲最勤，求敦煌曲資料最力的任二北，任氏誤會羅振玉所得底本，爲伯希和寄自巴黎的另一寫本。事實上伯希和寄贈，乃得自斯坦因。天下實無第二本法藏敦煌《雲謠集》。其他因未見原卷而臆改、誤校者，更是所在多有。因此乃有《敦煌雲謠集新書》的的著作。全書分「緒言」、「雲謠集卷子解說」、「雲謠集校箋」、「雲謠集雜曲子新書」、「雲謠集雜曲子摹本」、「雲謠集雜曲子照片」六部分。

緒言：總述前賢對《雲謠集》整理與研究之成果，並論諸家致誤之由，有誤鈔，如〈鳳歸雲〉題下有「閨」字，劉復迻寫作「街」，羅振玉、王重民迻寫作「偏」。有臆改，如〈柳青娘〉詞：「因何辜負少年人」，羅振玉臆改爲「因何辜負倚闌人」，更有據誤鈔臆改而輾轉改作者，其誤終至不可究詰。

「雲謠集卷子解說」：根據倫敦博物館及巴黎國家圖書館提供的影印原卷，詳細說明 S.1441 號、P.2838 及 P.3251 等三件《雲謠集雜曲子》寫卷的情形。並附錄歷來學者有關《雲謠集雜曲子》的題跋，且多鈔印一次，即多一次之糾紛。蓋因《雲謠集雜曲子》校訂的版本，提供前賢研究的完整資料。

「雲謠集校箋」：有關《雲謠集》雖校印日多，然迄無定本。寫本原卷簡字、訛字、別字，滿紙皆是，詞學專家猶難卒讀，更何論普通讀者。作者特據原卷，

細心讎校，並博攬諸家之說，擷其精華，正其訛誤，補其缺漏，詳就寫卷文字書寫習慣，探求詞語正詁，期能恢復雲謠集本來面目，撰成校箋。

「雲謠集雜曲子新書」：爲求使敦煌雲謠集此一千年未睹之秘籍，能成爲人人可讀之新書，乃捨原卷行款體式，正其題目，施以句讀，釐定片闕，改訂誤字，用通行字體，別爲新本。工楷重寫一通，以供學子誦習之用。

「雲謠集雜曲子摹本」：原卷照片雖可提供原貌，然寫本紙張有厚有薄，墨色有濃有淡，加以紙張摺紋、水漬漫漶，經作者目驗細看，一一描摹，可補照片之不足。

「雲謠集雜曲子照片」：據倫敦博物館及巴黎國家圖書館提供的原卷照片影印，使讀者得以衡量各家之說，目驗卷子，有採擇之憑據。

此書將原卷的全部照片加以影印，附上摹本，並參校各家作成定本，撰成《敦煌雲謠集新書》。此一完美的整理方式，既提供完整的敦煌《雲謠集》資料，又提供了無滯礙的閱讀文本，更爲董理敦煌文獻提供完美之法式。

（二）詞學研究法

1. 以求合乎詞體之善爲整理原則

敦煌曲子詞的價值，就文獻而言，主要在豐富唐五代的詞作；就詞學理論而言，則是提供了早期各式詞體與調式，可供探討詞的起源與體制等詞學家們所最關心的議題。因此，自發現以來，許多的詞學家如朱孝臧、冒廣生、龍沐勛、張爾田、趙尊嶽、唐圭璋先後投入敦煌曲子詞的整理行列。由於他們的學術背景的關係，促使他們在整理校錄敦煌曲子詞時，本能的會以詞學的角度與要求對這些唐五代的散篇零卷的曲子詞展開校錄。在方法上有別於文獻整理法，形成了敦煌曲子詞整理的另一特色。這一特色也就是所謂的「求善」。

「求善」所求的善，即合乎後世詞體的格律體式。他們以爲敦煌曲子詞的抄本是出自敦煌地區寺院僧侶或文化水平不高者之手，書寫率性隨意而訛亂滿紙，因此，在整理校錄時，往往以其他傳世的唐五代乃至宋代的詞作，進行比對；同時透過語言、文意、章解、句式、格律等方面來進行，而主觀的加以增刪改易，以求合乎其心目中的詞體規範；體現其理想的敦煌曲子詞的整理要求。

在此一基本觀念下，爲求詞文的順暢明晰，凡不合於其認定規範者，則或將之視爲「襯字」，或以「今刪」處理；或逕行改字，作「今改」，或以爲缺脫而隨意補字作「今添」。其中，尤其以任二北《敦煌曲校錄》最爲代表。甚至在他的《敦煌曲校錄》「凡例」中明白的說：「此錄宗旨不在保存唐寫卷之原有面貌，而在追求作者之原有辭句」。他在後來的《敦煌歌辭總編》「凡例」中也說：「此編目的不在傳達敦煌寫本原有之全部面貌，而在追求原作者心上原辭應屬之格調與應表之文字」。他所謂的「作者之原有辭句」、「原作者心上原辭」實際上是他個人主觀的認定。

儘管如此，但敦煌曲子詞畢竟是曲子詞，從詞學的角度來進行整理是必要且正確的；敦煌曲子詞是詞學發展過程中較早的一批材料，尙未完全定型；而傳世

的晚唐五代及宋詞大多為時代較晚，屬於發展後期的定型之作。因此以今逆古可作參考，而不宜視為絕對。理想則應以文獻的實情與詞學的相互的結合。

林玫儀也是以詞學研究出發，不過他在《敦煌曲子詞韻證初編》便是體認到此一現象而採取相互調和，兩者兼顧的研究方法。他為保持寫卷原貌，特按卷子排列。且於詞前之調名，亦盡量存其舊觀；若因原卷錯漏，不得不更動時，則一一予以注明。再者，敦煌曲辭中，未記調名或其詞調後世失傳，致無法參訂者，為數甚多，故如何判定調式，與其韻協之關係至巨。故於校訂文義之外，又兼定其韻協，每首正文之中，以「◎」號標示韻腳所在。至其原詞脫漏訛誤，或調式邈不可知，致其韻協難以遽定者，則謹守闕疑之義，僅以「。」號作為句讀。同時又以求真為主，故凡原卷可通者，悉從原卷，諸家校釋雖或詞義較勝而顯非其真者，一概不取；原卷難通，無法校訂者，則存其舊以俟通博。

2.探源的研究法

詞體的起源與形成是詞史上一個十分重要而又聚訟紛紜的問題。自宋代以來，就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探索，或以為李白〈菩薩蠻〉及〈憶秦娥〉為「百代詞曲之祖」；或以為源自樂府，起源於梁武帝之〈江南弄〉、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或以為詞係長短句，起於《詩經》長短句之什，不一而足，咸為推測之詞且輔證之乏具體詞作。敦煌曲子詞的發現，為數可觀的唐代各體詞作，為此一爭議提供了極為可靠的實證材料。學者紛紛據重勘再論。如唐圭璋《論詞的起源》一文則根據敦煌曲子詞結合唐《教坊記》等相關等資料，考證〈泛龍舟〉、〈穆護子〉、〈安公子〉、〈鬥百草〉、〈水調〉、〈楊柳枝〉、〈河傳〉等七調確實屬於隋曲，並指出「有樂曲就有歌辭」，這是「詞」起源於隋代的具體證據。同時又將「民間詞」與「文人詞」分別考察，而以為：詞的產生時代應是在隋代興起的民間詞廣泛流傳之後，即初唐晚期。夏承燾《讀詞常識》也以為：詞的產生最早起於民間，其時間最早是在隋代。並指出〈楊柳枝〉、〈河傳〉等詞調很可能是隋代的民歌；敦煌曲子辭的發現給詞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它以充分、堅實的證據，證明詞的創作，最早來自民間，中唐以後的文人詞則是在民間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之後也有強調唐五代詞發展過程，而採用描述研究法的論著出現，如方欣庵的《詞的起源和發展》。

3.形式分析研究法

當敦煌曲子詞經過學者努力的搜輯校錄，而有大量可資閱讀與研究之文本後，有學者開始對敦煌曲子詞的詞調、句式等文學形式進行分析和探討。主要有：林玫儀〈試論敦煌曲子詞之調式〉，據敦煌曲子詞中不見於後世的〈別仙子〉、〈怨春歸〉、〈柳青娘〉、〈喜秋天〉……等，舉出曲辭相同而調式互有出入者，並論述敦煌曲調對解決詞學問題之助益。柴劍虹〈敦煌寫卷中的《曲子還京洛》及其句式〉也是專從句式來析論敦煌曲子詞的論著。

4.詞學綜合研究法

敦煌曲子詞既是音樂又是文學，且所承載的內容亦具多元。因此採取綜合方法來進行研究，可對敦煌曲子詞有較為全面的認識。如宛敏灝〈從敦煌曲子詞和

花間集談詞的發展）一文針對詞的興起與社會、音樂、文學等方面的密切關係進行考察，以為：唐代商業經濟發展，促使市民階層的擴大造成藝術活動的需求，使得所謂合胡部的燕樂在民間廣泛的流行。最初以五、七言詩為主，之後逐漸發展出樂工、伶人按樂譜節拍試製長短句的曲子詞的產生，終至詩人也採用這種新的體制而大量創作起來。

（三）文學主體學的研究法

以作品主題作為研究對象，是近代詩歌文學研究常用的手法之一。敦煌曲子詞的內容主題也頗為集中而深具特色，近年研究者也多有以主題學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的。如王忠林〈敦煌歌中「征婦怨」辭析論〉，根據任二北《敦煌歌辭總編》中的「征婦怨」主題進行研究。以為：「征婦怨」之名見於中唐，其他託名〈擣衣〉、〈秋夜長〉、〈關山月〉、〈折楊柳〉、〈別離怨〉、〈閨怨〉、〈古別離〉、〈恨從軍〉、〈思邊〉等篇名的，也都是寫閨中征婦的苦怨。唐人詩中，寫戰爭的殘酷和疾苦的，也透露了反對戰爭的心意。敦煌歌辭〈鳳歸雲〉、〈洞仙歌〉、〈破陣子〉……等五十幾首的征婦怨，正如同任二北所說的：「盛唐之『征婦怨』，乃初唐歷史之產物；中唐所結之『果』，應又出於盛唐之『因』。」說明了他的時代意義。

周延良《敦煌情愛詞研究》，全書上卷對《雲謠集》及敦煌曲子詞中有關愛情題材曲詞進行校釋，中卷則對敦煌情愛曲詞的「意象類型」及悲劇情感結構進行論述。下卷，則延伸到據敦煌曲詞以探討詞的起源問題。另外如楊寧貞的《敦煌邊塞詞研究》也是針對敦煌曲子詞中的邊塞主題來進行研究的學位論文。

（四）文學文化學的研究法

文學是文化的部分，也是文化表現的載體。因此透過敦煌曲子詞來進行時代社會文化之研究，也是在文獻整理大抵完成後，常被留意的研究課題，文化學也是常被採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如：林玫儀〈論敦煌曲的社會性〉，以為：敦煌曲子詞的內容中，有關征戍之苦，四夷歸心，淪陷區民眾之心聲，君王之蒙塵等等，都是史實之反映。若就此觀點言，敦煌曲實具有「史詩」之性質。同時也透露出一般社會民眾的生活概況。敦煌曲子詞既是民間文學，所呈現的是屬於社會大眾的文化，它有生動活躍的生命，質樸真純的風格，它刻劃出民間生活的百態，所以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一幅情感豐富，內容真純的平民社會生活圖。而乞巧、鬪草、拜月等風俗習慣，都是這幅生活圖中鮮明美麗的一部分。邱燮友〈唐代敦煌曲的時代使命〉一文便是從敦煌曲子詞的題材和內容，從社會、文化、宗教、教育、音樂文學等觀點，來探討敦煌曲子詞的功能和效用，以明瞭敦煌曲在當時所具有的時代使命與社會意識。又如高國藩〈試論敦煌曲子詞的市民性〉也是從曲子詞的文化內容來探討所反映的市民性。王忠林〈敦煌歌詞與民俗活動〉則是針對敦煌曲子詞的相關材料來探討唐代的民俗活動。劉尊明〈唐五代敦煌民間詞的文化蘊含〉視敦煌民間詞為唐五代的生活畫卷，進行其文化蘊含的探究。

五、 敦煌曲子詞研究的展望

自敦煌寫卷發現，使湮滅千載的唐代曲子詞得以重現人世。根據這批寶貴的敦煌曲子詞，我們在千載之後可以窺見詞的早期風貌，同時對於自來詞學上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透過這些資料而得以一一澄清。其有助於中國詞史的研究，自不待言。不僅如此，敦煌曲子詞的作品內容廣泛，舉凡兒女之情懷、閨婦之怨思、邊民之心聲、遊子之悲吟、伎女之感慨、醫生之歌訣等，包羅萬有，不一而足，洵為當時社會生活的實錄。且其文辭質樸，情意真率，深富民間文學清新動人之氣息，就文學價值言，尤為難得之瑰寶。八十年來，在前輩與今賢的持續努力下，已取得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近年許多整理校錄的文本陸續出版，專題研究或曲詞文學賞析之作也紛紛出籠。然而當我們一方面慶幸近年敦煌學研究環境空前的改善時，卻觀察到敦煌曲子詞的研究成果卻出現了急遽下滑的現象，不禁令人懷疑，敦煌曲子詞研究是否能有未來？有發展的餘地？因此，我們考察回顧過去研究發展的歷程，吸取前賢的研究成果與借鑑前賢的研究業績與方法的同時，提出以下幾點展望。

（一）研究範疇的再界定

敦煌學是一門以資料為核心的新興學科，沒有資料，則無從研究。敦煌曲子詞的研究也不例外。敦煌曲子詞的概念與範疇更決定資料多寡的第一要素。曲子詞的範圍自來寬窄不一，範疇寬窄直接影響研究的取材。〈敦煌詞〉或〈敦煌曲子詞〉與〈敦煌歌辭〉及〈敦煌曲〉嚴格說是不盡相同的。而且「曲子」、「小曲」與「俗曲」、「佛曲」等概念也有所差別。因此也就有所謂廣義的曲子詞與狹義曲子詞的區分。狹義的「曲子詞」觀點，即合乎傳統所謂「詞」的性質者，則總數將不過二百首。至於定格聯章、大曲、佛曲等過去不列入敦煌曲子詞範圍，則為現在所謂廣義的敦煌曲子詞所收錄。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全書收入 162 首，以傳統詞的觀念輯錄，而不收佛曲歌讚。然任二北《敦煌曲校錄》、《敦煌歌辭總編》；戴密微、饒宗頤《敦煌曲》則採廣義概念，收入較廣。如任二北《敦煌曲校錄》擴大範疇，將佛曲歌讚納入，計收取 545 首，材料遽增三倍有多。《敦煌歌辭總編》收錄的數量更多。可見觀念開放，必能擴大範疇，增加材料；而範疇的界定，更可明確研究的對象。

（二）研究材料的再爬梳

近年來一系列大型圖錄的陸續出版，大大地改善了過去受制於資料的困境。許多新材料也首次披露，其中不乏文學文獻；此外已公布的文獻，因過去缺乏據原卷進行審視篩檢的條件，每有失收、遺漏與誤認的。篩檢今所得見敦煌文獻中的文學文獻，利用已公布的公私藏卷目錄，確實審核原卷。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印

行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自第 11 冊起均未標目，其中不乏有未被得知的敦煌文學作品。同樣的，敦煌曲辭迭有發現。例如王重民、任二北之後，周紹良曾據莊嚴堪所藏《維摩詰經》卷背所錄，補路敦煌曲子詞十三首。⁵今見《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公布津藝 134（77.5.4473）《維摩詰所說經》卷下的背面抄有失調名及〈浣溪沙〉等十三首曲子詞，均是極為珍貴。其他新近公布的敦煌資料中，若能一一細檢，應可有所發現。

（三）校錄文字的再確認

敦煌曲子詞的作品全部為手寫本或手抄卷，抄寫者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抄寫的隨意性和混亂性，也為敦煌曲子詞的整理研究帶來了另一個困難，即校勘的複雜與艱難。

俗文學的特性，除了題材的廣闊，形式的活潑創新與手法的生動外，最主要還在文字與用語的通俗。特別是敦煌寫本俗文學作品中的俗寫文字更是令人頭痛，如入五里霧中的迷障。潘重規先生在〈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一文即說道：

敦煌寫本，保存了不少俗文學，而保存下來的俗文學，幾乎都是用俗文字寫成的。敦煌卷子中儒釋道三家的經典，很多是由名寫生工楷書寫，還經過一校再校的勘正，閱讀起來困難較少。但是，俗文學如變文、曲子詞等，多半是經俗手寫俗字而流傳下來的。我們可以說，如果不通曉敦煌俗寫文字，幾乎就讀不通敦煌的俗文學。⁶

敦煌變文、曲子詞、白話詩等通俗文學自發現以來，即深受矚目。此類作品的特色，主要在充分運用唐代民間通俗語詞，而這些通俗語詞多為傳統字書所不錄，因此往往造成解讀上的障礙，使後人於整理此類作品時每每因不解而滋生許多錯誤。潘先生曾說：「凡欲研究某一時代之作品，必須通曉一時代之文字；欲通曉某一時代之文字，必須通曉某一時代書寫文字之慣例。」⁷因此，已知文學作品的錄文宜再確實校釋，特別是俗文字、俗語言的充分認識，方能得到文本的確解。蔣禮鴻〈敦煌詞校議〉就是特別著重在詞彙的考釋。

（四）研究方法的再創新

學術研究乃是積累與承續的工作，前人研究的成果是後人研究發展的基礎與借鑑。過去敦煌文學研究成果豐碩，然只要對每一課題能持續深入的鑽研，相信還是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檢視前賢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大多集中在許多重要的文

⁵ 見周紹良〈補敦煌曲子詞〉，載《敦煌學論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頁68-72。

⁶ 見《孔孟月刊》第十八卷第十期，1980年7月，頁38--46。

⁷ 《敦煌俗字譜·序》（台北：石門圖書公司，1978年），頁5。

學門類，如敦煌變文、敦煌曲子詞等，除此之外，應尚有許多園地有待開發。

敦煌文學研究法相較於其他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探討是較為薄弱的一環，一般以文字校訂、內容考證為主。事實上，文體學、語言學、故事學、乃至比較文學所使用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與主題學研究……等等，均常為前輩學者所運用，只是少有討論。就學術研究而言，材料會影響方法的使用，方法也會有助於研究成果的呈現，敦煌文學研究是否有較為妥適的研究方法，似可從前賢研究中加以考察與提煉，強調跨學科的整合，是很有必要的。

（五）研究視野的再開闊

文學是社會的產物，特別屬於俗文學的敦煌變文、曲子詞、白話詩，作者多為半知識份子，所使用的語言民間口語白話的俗語言，作品呈現的思想內涵則是民間的俗文化，與一般傳統世人文學有別。尤其是地處西北邊陲，胡漢雜處的敦煌，其文學的表現尤具地方色彩與歷史特質。因此，敦煌曲子詞研究的未來，需立體的全方為的展開方能有所突破，除了應具詞學格律方面之素養外，還需要文字、語彙、聲韻、校讎方面之專才；同時也需要專研音樂、舞蹈、藝術、民俗之專家參與，絕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因此，針對這些特點，廣泛吸取歷史、社會、文化等學科的相關知識，進行整合研究，將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發展的必然趨勢。

Review 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Dun-Huang Lyrics their Methodologies

Chu Feng-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ay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un-huang Lyrics, since its discovery, have enriched the quantity of works of that genr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lso they provided the early balladic forms, forcing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origin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allads. This essay will study the research works concerning Dun-Huang Lyrics from a span of years between 1920 and 2000; documentary Bibliography will be the basis of this research, and pertaining to its history and taxonomy it is to conduct a ledger review on the matter. It will be a study from a macroscopic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is field, and will introduce comparisons with microscopic analyses and generalizations of the works of predecessors, and through them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studies of the Dun-Huang Lyrics.

Key Words : Dun-Huang Lyrics Dun-huang folklores Yun yao chi(Ballads of Cloud: an anthology) ballads of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